

# 公共服务均等、政治平衡与转移支付

——基于 1998—2005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宋小宁,苑德宇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财政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中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论述没有充分重视政治因素,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中、不断发生各种利益冲突的大国,中央的转移支付经常出于政治平衡考虑。本文利用 1998—2005 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转型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决定因素,在控制了影响转移支付的其他因素后,我们发现我国的转移支付主要由中央维护国家稳定、减少改革阻力的政治平衡考虑决定,公共服务均等因素的效应并不显著。

**关键词:**公共服务均等;政治平衡;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 (2008) 04-0092-06

## 一、引言

在有多级政府的国家中,往往会发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这主要由三个原因引起:一是公共品的区域外部性,一个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除了惠及本辖区的居民外,往往还会使辖区外的居民受益,尤其是相邻区域的居民。二是财税体制,地方政府通常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而拥有更小的税基,这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因此拥有更大税基的中央政府就会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虑,一个国家应当平等地对待他的公民,让不发达地区的公民也尽可能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

基于这种理论,已有对转移支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评价转移支付的效果上,主要有两类:一是研究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马拴友等(2003)<sup>[1]</sup>分析了 1994 年税制改革以后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的关系,发现转移支付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

果。Yao (2006)<sup>[2]</sup>利用 2002 年县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发现,转移支付对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的反均等化效应和挤出效应。二是研究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均等化的影响。Tsu (2005)<sup>[3]</sup>根据 1994—2000 年的数据,利用通熵指数分析了县级财政不平等的变化,发现税收返还和分税制改革后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财政差距,反而占财政不平等的 20%。解垚(2007)<sup>[4]</sup>的研究也表明转移支付在缩小城乡公共品的差距上的作用不大。尹恒等(2007)<sup>[5]</sup>利用全国 2000 多个县 1993—2003 年的数据发现,财政转移支付不但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财力差异,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这就说明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实施可能还由其他的因素决定,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所指出的那些因素。理论和现实产生了矛盾,就需要先研究清楚我国转移支付到底由哪些因素决定,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多大。

收稿日期:2008-01-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86)

作者简介:宋小宁(1981-),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E-mail: songxiaoning2000@163.com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较早揭示这一问题的学者是 Raiser(1998)<sup>[6]</sup>,他在对 1978—1992 年间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一项研究中已经发现,尽管所有穷省都得到了数量不等的补助,但最穷的省份却未必得到最高水平的补助。补助水平最高的是那些非汉族人口为主的省份,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超过了那些最穷的省份。这个发现促使他开始怀疑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可能是由中央的政治平衡驱动,而不是公平性考虑。wang(2004)<sup>[7]</sup>利用 1998 年各省的截面数据对这个猜想做了经验分析,认为国家统一的政治考虑是转移支付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公平性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为 Raiser 的猜想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Raiser(1998)基于 1978—1992 年的转移支付研究存在局限,一方面,这段历史时期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大规模进行,所以下岗职工的数量不是很多,未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1992 年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形成了大量下岗职工,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利益,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离退休人员数量不是很多,退休金还能正常发放,但随着国有企业破产数量的增加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大量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不能正常发放,因此这个群体就会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此外,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中央转移支付的数量一直在加大。但是 Raiser(1998)仅考虑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未重视这几个群体的力量。此外,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所以需要研究 1994 年之后这几个群体是否包含在中央的政治平衡考虑中。wang(2004)的研究尽管为 Raiser(1998)的猜想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但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政治因素上未包含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和农民的政治力量。第二,公平考虑上主要用人均 GDP 和农业所占比重来作为解释变量,这两个指标主要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平,但不能充分反映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第三,政治经济情况一直在不断变化,只选取 1998 年的转移支付数据不足以验证理论猜想。第四,计量方法上只采用了 31 个省际截面数据,这会由于影响各省转移支付不可观察变量的遗漏而造成估计值的偏误。

本文扩展了 Raiser(1998)的政治力量的内容,除了少数民族之外,还包含下岗职工和农业人口;吸收阿马蒂亚·森的相关理论,公共服务均等方面中用人均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以及人均民政支出这三项最主要的公共服务来表示;用 1998—2005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来分析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总体上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

## 二、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制度

1994 年分税制改革通过明确划分不同层级政府的税种和分享比例,提高了中央在整个预算收入中的比重和整个预算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实施改革的关键措施是:第一,把增值税和消费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用统一的分税制度取代以前固定上交的办法,增值税的 25% 属于地方政府、75% 属于中央政府,下一年增加部分的 30% 留归地方政府所有。第二,中央企业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所得税属于中央预算,其他企业的所得税属于地方预算。第三,小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属于地方预算。

分税制改革后,能取得较多税收收入的税种归中央,或者中央拥有其较大的分享比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持续增加。同时,地方政府在拥有较小的税种和较低分享比例的前提下,却要承担很大的支出责任,这就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我国转移支付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维持原基数特征、以税收返还及体制有税收返还、补助(体制上解)为主的转移支付。二是包含旧体制特征、以专项补助为主的专项转移支付。三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是解决横向不平等。三类转移支付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 三、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设定

### (一) 变量选取

我们分析中被解释变量是中央对各省的净转移支付,用各省的中央补助收入(含中央的税收返还)扣除上解中央支出的剩余部分表示。主要的解释变量有 3 组:

#### 1. 政治力量

(1) 少数民族人口数(MNOP)。为了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安定团结的局面,我国一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对少数民族采取较为优惠的政策。转移支付方面,有民族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一方面有中央财政安排的资金,另一方面享受民族地区增值税中央分享部分环比增量的

80%。所以，本文选取的省份是拥有民族自治县 级以上行政单位的省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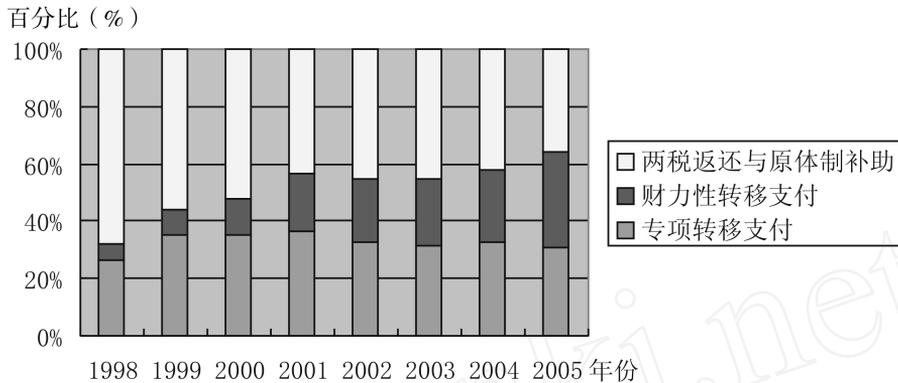


图1 三类转移支付结构柱形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的《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汇报》及参考文献 [8]。

(2) 下岗职工人数 (LAOFFP)。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持续推进，我国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大量快速增加。这些下岗职工大都属于“40、50”人员，再就业非常困难，因此伴随着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城市贫困现象凸现出来。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地区和企业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更加剧了下岗职工同改革收益者的矛盾。所以，下岗职工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将会影响城市的社会治安和稳定，这会影响到中央对这个群体转移支付的额度。

(3) 离退休职工人数 (RETRP)。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和持续亏损，企业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发放存在较大困难。另一方面，财政困难地区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也很难按时、足额领取退休金。这些离退休人员会利用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当前的决策者。

(4) 从事农业人口数 (AGRIP)。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和其他各类农产品普遍出现供过于求，“谷贱伤农”，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相当多的地区农民收入不是增长而是下滑。与此同时，长期困扰农村的“三乱”问题加剧，激化了农民同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税费改革后，随着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农民又承担了大量“暗税”，因为工业品的增值税是包含在价格中。此外，又面临医疗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稳定，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所以中央会安排相

应的转移支付给这个群体。

## 2. 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

(1) 人均卫生支出 (AMEDEX)。根据阿马蒂亚·森关于经济发展评价的理论，防护性保障是衡量人的自由水平进步的重要指标。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是防护性保障的主要内容，无论公民居住在国家的哪个地区，基本的健康权都应该得到保障。所以，享受的医疗水平可以反映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

(2) 人均教育经费 (AEDUEX)。教育是人的基本发展权利，在阿马蒂亚·森的理论中属于社会机会的基本内容。一个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受的教育。教育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一个儿童和少年在未来一生的竞争中处于优势还是居于下风，进而会因为它的代际承传作用影响到其下一代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教育是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用人均教育经费反映这一项公共服务。

(3) 人均民政经费 (ACIADEx)。民政对象通常是伤残人员、烈士、城市和农村的社会救济人员，民政部门的服务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安全网，保障社会中失去劳动能力的群体和没有足够能力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群体。因此，我们用人均民政经费反映这项公共服务。

## 3. 控制变量

我们用影响转移支付的两个变量来分离其对转移支付的影响，从而明确分析我们所考察的政治组和公共服务组变量的影响。

(1) 受灾经济损失 (DISALOSS)。一旦某地

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中央政府通常都会安排专项资金来帮助灾区人民渡过生活难关，并且帮助其恢复生产和生活状态。因此受灾经济损失会影响中央的转移支付。

(2) 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POPUR)。分省转移支付数量的确定都会考虑到该省总人口的规模，尤其是公共服务项目的转移支付的确定中，人口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二) 模型设定

因为转移支付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税收返还，而税收返还主要是为了维持税制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探讨扣除税收返还后的净转移支付的决定因素也很有必要，所以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TRANSF_{it} = \beta_1 AEDUEX_{it} + \beta_2 AMEDEX_{it} + \beta_3 ACADEX_{it} + \beta_4 MNOP_{it} + \beta_5 LAOFFP_{it} + \beta_6 AGRIP_{it} + \beta_7 RETR_{it} + \beta_8 DISALOSS_{it} + \beta_9 POPUR_{it} + \mu_i + \tau_t + v_{it},$$

$i=1, \dots, N; t=1, \dots, T$  (1)

$$NTRANSF_{it} = \beta_1 AEDUEX_{it} + \beta_2 AMEDEX_{it} + \beta_3 ACADEX_{it} + \beta_4 MNOP_{it} + \beta_5 LAOFFP_{it} + \beta_6 AGRIP_{it} + \beta_7 RETR_{it} + \beta_8 DISALOSS_{it} + \beta_9 POPUR_{it} + \mu_i + \tau_t + v_{it},$$

$i=1, \dots, N; t=1, \dots, T$  (2)

其中，下标  $i$  为省份， $t$  为时间； $TRANSF$  表示未扣除税收返还的转移支付， $NTRANSF$  表示扣除税收返还后的转移支付； $\mu_i$  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 $\tau_t$  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 $v_{it}$  为随机扰动项。需要注意的是： $\mu_i$  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变量，它代表各个地区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由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也影响转移支付，但是没有被包括在回归模型中。 $\tau_t$  是一个不随省份不同而变化的变量，它解释了所有没有被包括在回归模型中而和时间有关的效应。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财税政策经常变化，这些政策会影响转移支付。这两点对于我们的分析特别重要，如果不考虑这些地区的异质性和政策环境的时序特征，考察各种因素对转移支付的效应就可能会出现偏差。

关于上述回归模型的特性中，还存在一个有待讨论问题。如果假设  $\mu_i$  和  $\tau_t$  是固定的待估参数，且随机扰动项服从  $v_{it} \sim ID(0, \sigma^2)$ ，则计量模型就是一个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残差项的 3 个因子都是随机的，并且  $\mu_i$  和  $\tau_t$  都与每一个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计量模型就相当于一个随机效应

模型。由于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强的理由来支持选择哪一种模型进行估计更为合适，我们依据 Hausman 模型设定检验的结果做决定，放弃了随机模型而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我们选取了拥有民族自治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 19 个省份 1998—2005 年的数据。以上各个指标数据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应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民族年鉴》、《中国民政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国财政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四、估计结果

根据以上设定的计量方程，考察控制组变量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分别把控制组变量同公共服务组变量、政治组变量结合考察这两组变量对转移支付的影响，把所有变量放在一起考察其对转移支付的影响。

根据方程 (1)，以扣除税收返还额的转移支付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如表 1 所示。

公共服务均等、政治平衡与转移支付的实证分析结果

变 量				
人均教育支出		- 22.963 (1.408)		- 3.711 (- 0.228)
人均卫生支出		- 22.853 (0.592)		- 22.691 (- 0.621)
人均民政经费		- 7.275*** (10.157)		- 4.459*** (- 3.780)
少数民族人口数			23.366* (1.874)	34.123** (2.533)
下岗职工人口数			70.601** (3.011)	48.585* (1.758)
农业人口数			14.094*** (9.271)	14.658*** (3.831)
离退休人口数			2.895 (0.139)	24.802 (1.157)
受灾经济损失	0.109* (1.697)	0.0892* (1.810)	0.0519 (1.119)	0.099** (2.115)
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68.080** (2.248)	83.691*** (3.645)	67.484* (1.831)	70.974*** (3.148)
Adjusted R-squared	0.70	0.74	0.85	0.88
F-Statistic	51.79	60.28	65.03	67.55
观测数	152	152	152	152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表 1 的第 4 列仅考察了受灾经济损失

由于数据缺失，西藏没有被包括在内。

(DISALOSS)和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POPUR)对转移支付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这两个变量对转移支付有显著影响。第1列在控制了受灾经济损失(DISALOSS)和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POPUR)后,考察了人均教育支出(AEDUEX)、人均卫生费用支出(AMEDEX)和人均民政费用(ACIADEX)对转移支付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卫生费用支出的作用均不显著,人均民政费用具有高达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在我们所考察的时间区间内,教育和医疗这两项最主要的公共服务并未得到现有转移支付安排的重视。在1998年之后,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央的转移支付中的份额迅速增加,这一政策效果非常明显。第2列在控制了受灾经济损失和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POPUR)后,考察了少数民族人口数(MNOP)、下岗职工人口(LAOFFP)、农业人口(AGRIP)和离退休人口(RETRP)对转移支付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前3个因素的作用均显著,离退休人口的作用不显著。其中,下岗职工人口对转移支付的影响最大,这说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伴随着大量下岗职工而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因为城市的稳定对我国政治经济秩序至关重要;第二为少数民族人口,因为历史、文化、经济的原因,少数民族在中央的决策中处于重要地位;第三为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因为居住在较为偏远地区,在政治上缺乏自己的代言人,一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中央对这个群体的重视程度近几年来才逐步增加。第3列同时考察了3组变量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前面的估计结果基本不变,主要的政治因素对转移支付有显著影响,主要的教育和医疗这两项公共服务水平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方程(2),以扣除税收返还后的转移支付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2001—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比,表2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公共服务的人均教育支出(AEDUEX)在10%水平上显著。不管是否添加政治组变量,结果都同样显著。与表1结果相同的是,人均医疗支出(AMEDEX)仍然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中,缺乏配套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导致地区之间居民享受的医疗服务水平较大差别的原因之一。总的看来,分税制改革一方面维持了既得利益,表现为许多富裕省份(如广东、

江苏、上海、浙江和辽宁等)得到大量税收返还,而贫穷的中西部省份只能得到很少量的税收返还。以广东和贵州为例,广东2005年的税收返还为226.4亿元,贵州仅为48.52亿元,约为广东的1/5。另外,增量改革部分考虑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逐年加大,从1998年的6%提高到2005年的33%,但是1/3的比重对于实现各地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还远远不够。

公共服务均等、政治平衡与扣除  
表2 税收返还的转移支付的实证分析结果

变 量				
人均教育支出		-9.782 <sup>*</sup> (1.631)		-3.895 <sup>*</sup> (-1.801)
人均卫生支出		-16.273 (0.847)		-11.872 (-0.214)
人均民政经费		-5.372 <sup>***</sup> (7.658)		-1.766 <sup>***</sup> (-3.911)
少数民族人口数			26.165 <sup>*</sup> (1.804)	43.096 <sup>*</sup> (1.781)
下岗职工人口数			65.231 <sup>*</sup> (1.68)	47.949 <sup>*</sup> (1.694)
农业人口数			13.094 <sup>***</sup> (5.372)	14.741 <sup>***</sup> (3.109)
离退休人口数			5.467 (0.139)	39.068 (0.1130)
受灾经济损失	0.112 <sup>*</sup> (1.697)	0.0792 <sup>*</sup> (1.810)	0.0643 <sup>*</sup> (1.689)	0.049 <sup>***</sup> (2.453)
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68.080 <sup>*</sup> (1.669)	71.562 <sup>**</sup> (2.183)	47.484 <sup>**</sup> (2.238)	60.300 <sup>***</sup> (2.398)
Adjusted R - squared	0.60	0.64	0.72	0.78
F - Statistic	40.81	49.57	52.42	56.21
观测数	95	95	95	9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水平上显著。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在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分配格局主要由政治力量决定,并不是按各级政府的支出需求来分配。通常是行政级别越高的政府

获得的转移支付数量越大, 省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数额最大, 其次为市级政府, 县级政府的数额最少。这与地方政府的支出格局严重不匹配, 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最大的是县乡政府, 其次为市级政府, 最小为省级政府。第二, 经济分权同政治集权紧密结合, 地方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造成特定的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好, 进而转移支付资金被挤占和挪用。基于 GDP 政绩考核下各省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 造就了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激励进行基本投资建设, 在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上支出的激励较弱。所以, 在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存在困难的情况下, 转移支付资金很容易被挪用。第三, 多部门拨付转移支付资金, 造成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我国转移支付资金并不是单独由财政部负责拨付, 中央其他部门也参与其中。根据国家审计署 2005 年的审计报告显示, 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 37 个。这种由中央主管部门对口下达补助地方资金的做法, 打乱了正常的预算管理级次和资金分配渠道, 造成中央财政本级预算支出和补助地方预算支出不真实。第四, 转移支付结构中, 维持既得利益格局的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超过一般的份额主要返还给经济发达地区, 而这种转移支付是扩大地区间财政差距的。虽然从趋势上看, 这两项在整个转移支付体系中的比重逐年减少, 由 1998 年的 67% 降低到 2005 年的 36%, 但其所占比重仍然在 1/3 以上。

## 五、结 论

本文构建了包含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 基于 1998—2005 年省际面板数据, 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 多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确定并非如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原因, 政治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第二, 转型经济中不断出现利益受损者和受益者, 利益受损者会影响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中央政府会利用转移支付手段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以推进改革的进行。第三, 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中央主要基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减少改革阻力的政治平衡考虑, 公共服务均等上的考虑在我们所考察的时间区间并不显著。其中, 中央政治平衡考虑的重点依次是下岗职工、

少数民族和从事农业人员。

本文的研究表明, 需要反思我国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和具体资金的落实。一方面, 在区域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逐渐加大的情况下, 需要把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使居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少地依赖于其户籍所在地。另一方面, 需要建立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 尤其是在地方财政财力紧张地区, 尽量避免转移支付资金被挤占和挪用。最后, 需要反思目前根据行政权力配置转移支付资金的方式, 规范省级以下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 参考文献:

- [1] 马拴友, 于红霞. 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 [J]. 经济研究, 2003, (3): 26 - 33.
- [2] Yao, Yi. Equalizing or Not? Assess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 Grants and Their Incentive Effects in China's Fiscal Reform [R]. Working Paper Accepted by Far Easter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July 9th - 12th, 2006,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 [3] Tsui, K. Local Tax System,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 173 - 196.
- [4] 解堃. 转移支付与公共品均等化分析 [J]. 统计研究, 2007, (6): 63 - 66.
- [5] 尹恒, 康琳琳, 王丽娟.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 [J]. 管理世界, 2007, (1): 48 - 55.
- [6] Raiser, M. Subsidizing Inequality: Economic Reforms, 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34 (3): 1 - 26.
- [7] Wang Shaoguang. For National Unity: The Political Logic of Fiscal Transfers in China [A]. Ding Lu & William A W Neilson, eds. China's West Region Development: Domestic Strategie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C].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4. 101 - 136
- [8] 李萍.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韩淑丽)